

秘境传奇之一下

龙骨

周谷城题



邬江 崔国民◎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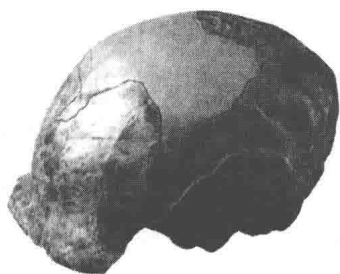
秘境传奇之一

龙骨

(下)

邬江 崔国民 著

周谷城题



北京燕山出版社

第十七章

龙殇·战火流莺

北平死去了！我至爱苦恋的北平，在不挣扎不抵抗之后，断续呻吟了几声，便恹然的死去了！

——冰心《默庐试笔》

前门·正阳门

前门位于北京中轴线南，正对着天安门城楼，这座始建于明代正统二年（1437年）的建筑，从地面到楼顶通高42米，面宽7间，进深24米。重檐三滴水的歇山顶，上铺灰筒瓦，绿瓦剪边。朱红楼阁，上下两层，上层前后檐都是菱花格的格栅门窗，下层是涂朱色的砖墙。南北两边各有一座供人出入的大门。正阳门箭楼则比前门楼晚两年修建，位于前门后身（北侧），从前门门洞可将正阳门与天安门尽收眼底。在城楼的東西两侧，各有一堵半月形瓮城与城墙和箭楼相连共同组成前门正阳门重要屏障。

1901年后，当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回北京，必须要通过前门、天安门进入紫禁城，为了保持龙颜国面慈禧下令整修道路并将前门正阳门城楼重新修复，但时间紧迫工程浩大无法短时间完成只好先用五色绸绦扎成城楼形状来凑合。直到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才将城楼修好。（参见陈夔龙《梦



蕉亭杂记》)

自古以来，作为皇都的北京，上自皇帝，下至黎民百姓都把前门视为国门，皇帝出行与外国人晋见都必须进出此门，在百姓心中前门也是至高无上的圣门。

熟知中国历史的今井武夫和香月清司自然而然首先想到要在前门举办日本军队入城式。穿着崭新笔挺军装的香月清司用戴着白手套的一只手掏出一条绣着樱花的白手绢轻轻拂拭胸前闪闪发光的勋章。他此时心情好极了，也轻松极了。他回忆着这不到一个月来走马灯似的经历，让他有惊喜有感慨。

也就在这之前，他还是个内阁教育总监部部长，一个主管教育的文职官员，一个来自内阁人事局局长的电话就鬼使神差地改变了他的人生：7月11日日本政府正式发表了“向华北派军的声明”，他接到了任命其成为驻华北驻屯军中将司令官并且命令“今天就去上任”的指令，12日从东京飞往天津，途经汉城时会见了朝鲜总督小矶国昭大将。

小矶话语诡秘地说：“征服中国的唯一办法是用强硬的态度摧垮之精神支柱。”香月感到困惑：“什么是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小矶笑而不答只是傲慢地一瞥：“让他们永远记住自己是东亚病夫。”香月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12日11时香月飞抵天津时关东军副参谋长今村均和参谋田中隆吉等人已在机场等候多时。下午3点立即召开了驻屯军全体幕僚会议，香月此时信心满满而且有些迫不及待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我的方针就两个字：强硬，必须达到目的，坚决严惩骄傲的中国人。”

此后他雷厉风行，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北平，做到了驻屯军前22任司令官未曾做到的事，他做到了日本帝国参谋本部那些傲慢的帝国参谋梦寐以求的“奇功”，这足以让那些只会在大本营里四处咆哮的将军们羡慕得流口水。

今井武夫为配合这次“皇军神威和战功赫赫”的举动马不停蹄地组建伪政权，而且他已获悉拒不合作的张自忠已留下一封“辞职书”后不知去向。

香月很清楚这是他预料之中的事情，也只好自欺地安慰自己皇军也会谅解。8月8日，日军举行入城式，这是香月精心挑选的日子，他就等着这一天：



他将光宗耀祖。

可天公不作美，军部突然下达一道命令：华北派遣军司令一职由寺内寿一中将担任，而他则立刻去一军上任军长一职。香月的美梦顷刻破灭了。大本营一纸调令，让原本春风得意的香月一下子跌进人生低谷，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被愚弄的感觉。

香月乘着月色想在离开北平前看看还未来得及细细欣赏的“战利品”，今井武夫紧随其后，此时也只有今井还带着无限惋惜的心情陪着他。

北平之战本是香月引以为豪之战，以为创造“帝国奇迹”的他反而招致军部一片诟言骂他对中国人过于仁慈，骂他放走帝国死敌二十九军……

他明白那些幕僚们是嫉妒自己“兵不血刃的头功”，尤其是对古皇宫区禁止炮击与轰炸。

今井因北平之战的功劳而开始飞黄腾达，而这位用20天创造夺取敌国大城市“奇迹”的文职将军香月清司却在战场上从此黯然消失……

1937年8月8日·北平

日军列队行进，队伍中的号兵吹起号，骑着高头大马在队伍中的日军司令却不是为之精心准备的香月清司，而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寺内寿一。

寺内寿一耀武扬威，他频频向道路两边身穿和服的日本侨民和旅游团的日本学生招手示意。这些挥舞日本国旗和手持写着“陷落”字样灯笼的日本人欢呼雀跃，大喇叭里一遍又一遍地放着日本国歌《君之代》和日本海军《军舰进行曲》，乱哄哄的叫喊声、歌曲声与排成品字形的土黄色装甲车、坦克隆隆声响成一片，而碾轧着前门大街的战车，喷出的油烟和碾起的尘埃遮天蔽日，天昏地暗。

而沿途的被迫“欢迎”的师生却低着头，许多人痛苦地流下眼泪。在人群中有一个年仅13岁的男孩看见这些趾高气扬的日本兵时，愤然将手中的日本国旗折成两截狠狠地丢在脚下并踩了两脚，扭身跑进胡同。大惊失色的老师与同学也一时炸了窝趁乱一哄而散。这位勇敢的少年正是日后成为中国“两弹一星”的奠基人之一的邓稼先。



当他跑回家中时一头扑在躺在病床上的父亲身边放声痛哭起来，大姐、二姐也跑过来，母亲王淑蠲才知儿子“闯了大祸”，她焦虑得不知所措。

“父亲，我们真的成了亡国奴了吗？！”少年抬起泪眼看着因肺病而憔悴消瘦的父亲。

“中国不会亡，永远不会！你到南方去投靠西南联大的王竹溪教授，还有郑华炽，咳！咳！……”剧烈咳嗽的人是北大著名教授邓以蛰，因重病无法随校南迁，见儿子如此忠烈，为躲避日军迫害决定立即将孩子送出北平。

与冰心一家一样，这个男孩抱着科学救国的梦想只身逃离了北平，从此这位倔强的少年就抱定“科技救国”的宏愿学习国防科技知识，他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中国核物理学家邓稼先。1947年他考进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并于两年后获得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他第一批返回祖国成为中国第一代核物理学家。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刚从欧美周游回国的冰心夫妇也目睹和亲历了那场让每个中国人不可忘却的一幕：

北平死去了！我至爱苦恋的北平，在不挣扎不抵抗之后，断续呻吟了几声，便恹然的死去了！

五光十色的旗帜都高高地悬起了：日本旗、意大利旗、美国旗、英国旗、黄卍字旗、红十字旗……只看不见了中国国旗！西直门楼上，穿着深黄色军服的日兵，箕踞在雉堞上，倚着枪，咧着厚厚的嘴唇，露着不整齐的牙齿，下视狂笑。街道上死一般的静寂，只有三三两两褴褛趑趄的人们，在仰着首围读着香月的入城通告。

晴空下的天安门，饱看过千万青年摇旗呐喊，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如今只镇定地在看一队一队零落的中小学生的行列。他们拖着太阳旗、五色旗，红着眼、低着头，来“庆祝”保定陷落，南京陷落……后面有日本的机关枪队紧紧跟随监视着。

日本的游历团一船一船一车一车地从神户、横滨运来。

挂着旗号的大汽车在景山路，东长安街横冲直撞。东兴楼、东



来顺都挂起日文的招牌，欢迎远客。

在故宫、北海、颐和园都看不见一个穿长褂或西服的中国人，只听见橐橐的军靴声、木屐声。穿长褂和西服的中国人都羞得藏起来，恨不得溜走了。

……我恨这美丽庄严的皮囊躯壳！我走，我回顾这尊严美丽，瞠目瞪视的皮囊，没有一星点留恋。在那高山丛林中，我仰首看到了一幅飘扬的旗帜。我站在旗影下，我走，我要走到天之涯，地之角，抖拂身上的怨尘恨土，深深地呼吸一下兴奋新鲜的空气；我要走，我要捐着这幅旗帜，来召集一星星的庄严美丽的灵魂杀入那美丽尊严的躯壳！……

冰心这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是一年后在重庆郊区的歌乐山住处写下的，她把在沦陷的北平所目睹的愤怒、耻辱、仇恨写进《默庐试笔》。

1937年7月9日·日本·门司港

卢沟桥上的枪声震动了全国，也惊动了千百万海外游子，他们纷纷从世界各地赶回祖国参加保卫祖国的伟大民族抗日战争。卢沟桥事变三天后，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就迅速串联，联合5000名学子从日本陆续返回笼罩在战火中的北平和上海。

有一位驻日本的中央社记者刘尊棋老人，在他的回忆文章《从东京归来》中记录了当时的真实情景：

这一天（7月7日）从早到晚，街上不断有报童边跑边摇着铜铃喊叫：“号外！号外！”……这次真的要打起来了？！我想。……哦！抗日战争！伟大的、神圣的抗日战争！我一天都不能再停留，我要立刻投身到战火中去。

……我找出当天的报纸，翻看到第二天有船从门司开往塘沽，急忙收拾必须携带的东西，简单写下告别的字，就出门直奔东京火



车站，打车去门司。

果然这一天(7月8日)有一条“长崎丸”客轮要从门司开出去塘沽。大约预定一天一夜可到。我买了船票，随着大批客人陆续上船，我注意到一大批穿学生制服的日本学生手持“北平”观光团的白布小旗上船，另外也看见不少中国学生上船。

甲板上空空荡荡，但船舷高处悬挂着一个扩音器，白天有时播出流行歌曲，但隔不久播出了新闻。新闻广播一开始，甲板上突然上来大批客人，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各自站在一边，互不打招呼，十分严肃地聆听着广播。

“同盟社下午三时十分急电，日本军已完成对宛平县的包围，并且从十二时起开始轰击城门楼的观察哨所……”

“Banzai Banzai (日语万岁)”日本学生一起喊叫起来。

“宋哲元将军率领的一个师已进驻北平南郊军事要地南苑……”

“万岁！万岁！”中国学生这方面也喊起来了。

这样，随着新闻广播声而此起彼伏的喊声一直到七点左右，扩音器再改了声音，宣布晚餐开始。整个船舱里人声鼎沸，人们紧张而热烈地议论着显然已经大规模展开的战争……火车经过天津和廊坊车站时，可以看见月台上已站着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警戒着。

“这哪里还像中国自己的国土啊！”我好像打了一个寒战似的自言自语着……走出车站，仰望巍峨的正阳门城楼，一种崇高的意识重新升起……

1937年8月21日·日本·大阪港

留日学生谢爽秋老人在《响应祖国的召唤》一文中详细地回忆了驻日留学生们在抗战爆发后纷纷回国参加抗战的激情往事：

……第二天，“特高”(日本特务)又来搜查古的行李(古子坚，



因七七事变后用笔名向南阳在报纸发表了几篇关于日本经济的文章，被日本人认为是日本情报。)取走了一些日本报纸的剪贴材料。其实，卢沟桥事变前夕，“特高”已经开始抓人，“世界语学会”的黄一寰、丁克、陈紫秋、李益三等四人，就因与日本左翼世界与学者有联系而同时被捕。黄是黄兴的后裔，经宫崎龙介设法营救，才被释放归国。

当时，东京一地就有中国留学生五六千人，事变后纷纷弃学归国。人多船次少，日本船又不敢坐，要挤上其他国籍的邮船，求得一席之地，很不容易。直到“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之后，才搞到一张“加拿大皇后号”从大阪到上海的四等舱船票……

船驶近上海时，正值吴淞口枪弹横飞、硝烟弥漫，进不了黄浦江，原定在上海上岸的，只好随船去香港，再转往广州。

当廖沫沙、田汉等人辗转来到即将沦陷的南京城时，还有一家四口人也风尘仆仆地从欧洲来到南京，他就是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裴文中。

七七事变后即将毕业的裴文中再也坐不住，他向自己的恩师步日耶表明自己坚决要回到祖国去，要与苦难的祖国同甘共苦。步日耶是世界古生物、古人类研究泰斗，是他在北京发现了这个挖出第一枚“北京人”头盖骨的中国青年。

步日耶不仅主持了对第一枚“北京人”头盖骨的测定工作并且做出了前所未有的“50万年前”的认定，这是当时在世界范围内唯一测定最长年限的古人类化石(尽管“北京人”头盖骨后来被重新测定为77万年，这仍丝毫不影响20世纪20年代这一发现的伟大)。也就在那个时候，步日耶热情地邀请裴文中去法国他所任教的大学攻读古人类学并承担裴文中留学期间所有费用。

步日耶手把手地教授这位来自东方的中国青年，他发现这个一头黑发的瘦高中国人是那样睿智和充满活力，他太喜爱这个弟子，甚至为他毕业后留在身边做自己的助手，做了周详的安排。当他看到裴文中每每看到或听到来自中国的战争消息就寝食难安的神情也不由得为他担心起来。



法国巴黎大学·人类古生物学研究所

一日裴文中拿着一沓新出版的《每日邮报》找到步日耶，将报纸摆在他的眼前，映入眼帘的是“日军占领北平”的大标语和日军从前门、正阳门下列队进入北平城的大幅照片。两人默默无语，步日耶看着自己的学生脸上充满痛苦和愤怒，他感觉到这个正直的青年要做出什么惊人的决定。

果然，沉默良久的裴文中艰难地一字一句向步日耶表态：“先生，我决定立刻回国！”

“你真的要这个时候回国去？”

“是的，我的祖国需要我。”

“可你是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啊，研究室是学者最好的战场啊，你看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一切。裴，你新婚不久，需要有个良好的工作环境，而这里可以满足你的一切。我恳切地请求你留下与我共同完成研究课题。”步日耶向实验室做了一个展示的手势。他想告诉裴文中他为裴文中已准备好当时最好的实验室。

“对不起，步日耶博士，我的祖国很穷很落后，但是她是我的母亲，她正在流血在哭泣，正在召唤她的儿女！”

裴文中打心里感激这位始终如一关怀自己的大师，但此时心中燃烧的火焰已让他义无反顾。而裴文中声情并茂的讲述也深深地感动了这个平日严谨的科学家，步日耶不知道裴文中十几年前就是北大校园内出名的“文学家”。他给《新青年》的投稿曾让大文豪鲁迅先生赞叹不已。步日耶此时明白了这个充满爱国激情的中国科学家是不会接受令无数人羡慕的条件、金钱和荣誉的诱惑的。他完全被感动被折服，对这个东方的学者肃然起敬。步日耶不愧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在以后的日子里不仅帮助裴文中筹集回国的资金及必需品，同时还叮嘱这个倔强的学生随时保持联系，不要中断对“北京人”的研究。

1937年冬·南京

南京城里到处是一片混乱和撤退的景象：政府机关、商会门口堆满撤退的木箱与行李，市民携幼扶老背着包裹匆匆向江边走去，满大街的黄包车和各



种车辆互相拥挤着叫嚷着缓缓向码头和车站拥去。只有路中间设立的沙袋边有一些身穿黄军装的宪兵与警察在维持秩序。

裴文中身穿长大衣、头戴礼帽和同样穿着短大衣和棉布裙的妻子从人群中逆行来到教育部大楼。当他们好不容易来到教育部时，这里大厅和办公室满地纸屑，待运木箱堆积如山，职员们出出进进正忙着把楼内的木箱搬出大楼，整个大楼内弥漫着紧张的气氛。裴文中拦住一个又一个胸前别着教育部徽章的职员打听翁文灏和负责官员，但都摇摇头不知所终。此时一位上了年纪的老者走来把裴文中夫妇打量一番：“你是裴文中先生吧？”

“是的，是的，我是裴文中，刚刚从法国回来。”裴文中急忙回答。

“哎呀，你们怎么这个时候来到南京？翁先生和蒋先生上周就已经撤到重庆去了！”

“那我们怎么办呀？两个月前我通过法国使馆给翁先生联系过，翁先生和部长指示我们到南京报到！”

老职员：“时局变化太快，世事难料！连蒋委员长也于上周撤离了，总统府现已经没人。不过这些天有不少各地投奔而来的各界社会贤达，上峰也指令由我们安排撤退，如再晚几天这里也没有人了。”

裴文中没想到形势如此严峻，不免有些焦急：“那么我们怎么办？”

老职员：“要不先生先撤往武汉，国府政要与中央研究院目前在武汉，或者随我们一起撤到重庆？”

裴文中看着妻子，仿佛要妻子拿出意见，妻子却默默摇摇头，裴文中明白了，他迟疑了一下试探性地问道：“在北平的地质研究所现在还在工作吗？”

老职员一脸惊愕：“什么？去北平？！那里已经沦陷了！地质所杨钟健先生和留守的主要人员在沦陷后就撤到南京了。”

裴文中急切地问道：“那么杨先生在南京吗？”

老职员想了想：“好像又去了云南，因为协和医院的研究项目是美国人办的，目前北平地质研究所一切事务都由协和医院代管。”

裴文中一听不禁心中大喜，因为他归国前就已得知北平协和医院的新生代研究室由魏敦瑞主持日常工作，而且得知日本人碍于是美国人管理而未对



协和医院采取措施，换句话讲裴文中如回到新生代研究室就可以正常开展科研工作。再加上他急迫地想回龙骨山，想念那些千辛万苦的而且使自己登上巅峰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兴奋之余他毫不犹豫做出了回到北平去的决定。翁文灏获悉后也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同意了裴文中返回北平的意见，并由中央地质所委任他担任新生代研究室中方副主任。

裴文中立刻在教育部留守人员的帮助下转道经广东、烟台回到北平。

裴文中一家刚离开南京一周后，南京陷落，南京陷入人间地狱般的血海之中，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爆发了。

1938年8月10日·广西桂林

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和浙大南下师生为妻子张侠魂举行公祭，一个月前他刚为自己的爱子竺衡送葬，如今又为自己的爱妻送葬。一年前淞沪战役时竺可桢就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将国立浙江大学迁至武汉，从美丽的天堂之城杭州迁移至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汉时正是武汉七月流火的日子，竺可桢夫妇冒着炎热的天气与师生一起到前线慰问抗战将士，组织抗日募捐和抗日宣传。但武汉很快也要沦陷，浙大师生被迫再次迁校。

8月3号妻子张侠魂因病去世。当竺可桢面对无药可治的妻子时他悲痛万分，因为他将浙大师生募捐的所有药品与钱款都送到前线，这位与他同生共死20年的妻子竟死于没有药物的普通痢疾，而自己年仅14岁的第二个儿子竺衡也在7月21日先于母亲去世。短短的13天竺可桢连续失去两位至爱亲人！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里写到：8月3号，星期三，泰和，侠于上午11点24分去世，悲哉！

竺可桢拖着消瘦而疲惫的身子缓缓在入殓的棺木绕棺一周，他将妻子最喜爱的一块手表和一支自来水钢笔放在妻子身边，把一枚银质戒指轻轻戴在妻子的无名指上，这是1920年结婚时竺可桢从哈佛大学回国带回的结婚戒指。追悼会没有讲话，只有1000余人师生与当地人士的哭泣声。

1938年浙大继续向西流亡到距桂林几百公里的小山城宜山，1939年2月5日日军飞机对宜山进行大轰炸，宜山市民死伤50余人，炸毁浙大学生二至四



年級的校舍（轰炸中，学生被褥、衣物、教舍全部烧毁，但没有人员伤亡。听闻浙大遭到野蛮轰炸，正在桂林教书的著名漫画家丰子恺立即决定接受校长竺可桢的邀请去浙大任教。临行前他对欢送他的朋友和同仁讲道：“浙江大学是我故乡的学校，它对我有不能想象的诱惑力。”浙江大学在流亡中一直坚持办学直至抗战胜利。

2008年已是耄耋老人的竺可桢在儿子竺安和竺宁陪伴下再次来到泰和看望当年旧居和张侠魂、竺衡亡地。

陈荒煤（著名电影艺术家，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回忆：

剧团还没有开始活动，北平就沦陷了，有一天早晨，听说日军就要进北平城了，我们剧团的一些人，还有孙席珍、陈北欧等一些教师乘上一辆卡车想出西直门到妙峰山，离开北平。不料到了西直门外，听说日军已经进驻香山一带，又只得回城作鸟兽散。

一直到北平与天津第一次通车时，我们才分别乘车去天津。这一趟火车几乎每一个小站都要停留许久。

我这个一心要到抗日战争前线去采访的人，这次可亲眼看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他们当火车到达的时候，倒没有上车检查，但是戒备森严面容冷酷，都端起了步枪在列车边上巡视，正是夏天，列车关着窗子，火车一停就是一二十分钟，甚至半个小时，车上静悄悄没有任何声音，我只觉得全身浸透了汗水，似乎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谁也不能料到会发生什么事。

这趟列车几乎走了一整天，到了傍晚才到天津。我终于进了英租界，找到了杨一辰的家，并且与荣高棠、杨一辰、张珩、张瑞芳几位同志会合了。

第二天打开报纸头栏标题是“四千赤色分子已逃亡来津”。

事后听说也有同志批评，许多同志不应这样挤在第一趟列车离开北平，万一这消息证明这第一次离开北平的绝大多数是“赤色分子”。这个估计，现在来看，也可以说基本正确的。敌人为什么“放



虎归山”呢？……

我们北平学生移动剧团终于在天津汇集，又乘海轮到青岛。原来计划先到上海，因为全团就我一个还不是专门从事戏剧工作的人，也只有张瑞芳一个业余演员，因此想到上海去找几位戏剧工作者参加剧团。不料到青岛就听到上海“八一三”的战争又爆发了，于是又下船改乘火车到济南，又去到南京，进行了剧团成立后的第一次演出，然后筹得一些款子，取得了一些关系返回济南一带工作，这一年间，从济南撤退，到鲁西北部队工作；在徐州会战期间又到徐州工作了一段时间，徐州失守后，我们又转到河南信阳一带休整。

我们这个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流亡的剧团。

7月我终于离开了剧团到武汉。我和宋之的、舒群、罗峰合写了一个多幕剧《总动员》，还想让剧团到武汉把这个戏搬到舞台，可是在一片“保卫大武汉”口号声中，国民党当局实际上是做武汉大撤退的准备了。剧团也不可能到武汉来。

我于9月就从武汉去到了延安。（参见陈荒煤《抗战纪实》）

廖沫沙（著名作家，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的回忆：

第一次逃难是1937年8月初。卢沟桥事变后，当时的北平处于日军炮火轰击的威胁之下，全城戒严、停市，居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我工作的单位，在战争起后一星期，就通知我不用去上班了。我只得终日在家，等候消息。

那时我住在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头发胡同一座小四合院平房，同住在这里的还有李何林先生，他住北房，我住西房，我是经亲友的介绍认识李先生的，那时他在大学教课。

平日常相往来的，除同事以外，除白薇、威猛克、蒋弼等还有师范大学的一些同乡同学……直到北平在7月底沦陷后我们便决定尽先逃出这个被日军占领的城市。

《龙骨》是以考古为题材的传记小说，波澜壮阔的视野，荡气回肠的情节，以北京本土为背景，讲述了中国百年考古的前世今生，那是一代长着“龙脊”的中华学者的传奇故事。在科学探索的险峰上他们勇于拼搏；在民族危难之时，他们义无反顾，英勇无畏地与侵略者殊死斗争！尽管人类瑰宝依然下落不明，但执着的“龙骨”人锲而不舍，四海追寻……

小说真实地、全景式地展现了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风起云涌的历史大背景下，艰苦、不屈，为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宝藏而彰显了自强不息的“龙骨”精神，热情讴歌了几代考古学家的忘我品质和爱国情怀。

龙骨喻示的是中华民族的一种风骨。

ISBN 978-7-5402-4178-0



9 787540 241780 >

定价：78.00元（上下册）